

Tiger
Writing

老虎
写作

Art, Culture, and
the Interdependent Self

[美] 任碧莲 著
Gish Jen

慈公 陈倩 译

艺术、
文化与
依赖型
自我

美国华裔女作家
的写作心路历程

本书将彻底颠覆
我们对自我辨识
及艺术创作的认知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Tiger
Writing

老虎
写作

Art, Culture, and
the Interdependent Self

[美] 任碧莲 著
Gish Jen

慈公 陈倩 译

艺术、文化与
依赖型自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老虎写作: 艺术、文化与依赖型自我 / (美) 任碧莲著; 慈公, 陈倩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6.9

书名原文: Tiger Writing: Art, Culture, and the Interdependent Self
ISBN 978-7-5192-1896-6

I . ①老… II . ①任… ②慈… ③陈… III . ①文学写作学—研究
IV . ① I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0819 号

Tiger Writing: Art, Culture, and the Interdependent Self
Copyright © 2013 by Gish Jen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著 者: 任碧莲
译 者: 慈 公 陈 倩
责任编辑: 郭意飘 陈俞蒨
排版设计: 刘敬利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37 号
邮 编: 100010
电 话: 010-64038355 (发行) 64033780 (客服)
64033507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wpcbj.com.cn>
邮 箱: wpcbjst@vip.163.com
销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30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登记: 01-2015-6134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谨记录

威廉·E. 马西美国文明史高级讲座

2012 年

谨以尊敬和感激之情，
以许多受过他启发与激励之人的名义
献给沃纳·索洛斯（Werner Sollors）

我是一个小说家。我通常不授课。但在一年半之前，哈佛美国文明史的项目主任约翰·斯托弗（John Stauffer）问我，是否愿意主讲由该项目每年主办的、三次课一个系列的“马西讲座”（Massey Lectures）。我答应了这一邀请。我之所以答应，不仅是因为我很荣幸（我当然很荣幸），更是因为我知道，尽管写了30年的长篇小说和文章，我骨子里还是有某种东西——我的文化背景与我每天应对的文学、文化之所以大相径庭的一种特殊方式，一直都无法被明晰地表达出来。

这之所以令我特别耿耿于怀完全是因为我的父亲。他是一位中国移民，最近写了一部让我一下子觉得既完全熟悉又全然莫名其妙的个人史。他为什



么会在描写他的宅邸之时花费那么多笔墨？我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他为什么不愿意多写写他自己？这之所以令我格外耿耿于怀，源于当我开始懂得如何阅读他的作品时，我看到其中所反映的自我——那是我总是在新闻里看到的自我，一个经常被报以困惑的自我，一如我曾经对这一切所做出的反应那样。更重要的是，我正逐渐意识到，那也是我自己的自我的一部分。

这些讲座，即这一困惑的结果首先同艺术与文化相关。然而，它们所描述的东西方之间的艺术脱节也碰巧使人们了解到世界上的许多角落——例如，近期的开罗。在美国驻开罗大使馆遇袭之后，令许多美国人感到困惑的是，示威者怎么可能是对一个愚蠢的人制作的一个愚蠢的视频，而不是对仇杀穆斯林的行为更感不满。对于这一点，《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援引了一个埃及人的回答：“当你伤害某人时，你只是在伤害一个人……但是，当你像这样侮辱一种信仰时，你是在侮辱感到痛苦的整个民族。”这似乎是一种合理的解释，有些人可能会因此而抱怨，另一部分人可能会感到非常奇怪——像



我曾经做过的那样，这种把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方式，与为什么中国人既是脸皮薄的又是民族主义的相关联？相应地，这又是否与为什么亚裔美国人的考试成绩都那么高相关联？

对于有机会回答这些问题，以及把从“我骨子里的某种东西”提取到页面上与回忆录、认知研究、文学分析和反思相关的组合“拉”到一起，我不胜感激。在我看来，我的发现和探索相当具有启示性，我现在非常希望能将这一成果讲给文坛内外的人听。我必须承认，我也想借此谈一下自己的工作，以及我是怎样成了一名作家。原因在于，约翰·斯托弗曾经暗示过，撰写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自传，其反响可能十分不俗。不过，这同时也是因为我早期的几位读者已经高声附和过他。当然，我希望我没有因为迁就他们而毁了这几场讲座。

无论如何，我都要竭诚感谢让这一饶舌之作成为可能的人。最先要感谢的是约翰·斯托弗和“马西讲座”委员会——每次一想到其邀请，我仍然会感到吃惊。讲座现场的奇观之一当属约翰·斯托弗绝佳的演讲摘要，以及由南希·科特（Nancy Cott）、



金株妍 (Ju Yon Kim) 和阿曼达·克莱鲍 (Amanda Claybaugh) 所进行的优雅而又慷慨之至的介绍。同时,我也要感谢为使这一切顺利进行而极其努力工作的众多幕后精灵们,特别是首席精灵阿瑟·巴顿-霍克 (Arthur Patton-Hock)。

对于审读本书早期草稿的诸多睿智而又敏锐的读者,我的感激之情不尽言表,其中包括艾琳·周成音 (Eileen Cheng-yin Chow)、大卫·达姆罗施 (David Damrosch)、帕特里夏·格林菲尔德 (Patricia Greenfield)、比尔·马克斯 (Bill Marx)、阿莉莎·麦凯布 (Allyssa McCabe)、玛莎·米诺 (Martha Minow)、沃纳·索洛斯 (Werner Sollors) 以及我的母亲艾格尼丝·任 (Agnes Jen)。在这里我也要感谢许多耐心的朋友,他们精准地、发人深省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无数个问题。同时,请让我说明一下,多亏了我的经纪人梅兰妮·杰克逊 (Melanie Jackson) 和她的助手凯瑟琳·陈 (Katherine Chen), 还有哈佛大学出版社那些热情而又进取的工作人员——林赛·沃特斯 (Lindsay Waters)、王山 (Shan Wang)、凯特·布里克 (Kate Brick)、玛歌·伦

纳德 (Margaux Leonard)、莉萨·罗伯茨 (Lisa Roberts) 和格雷格·科恩布卢 (Greg Kornbluh), 本书才最终得以出版。

在我欠下的所有人情债中, 最大的一笔将永远属于我的父亲诺曼·任朝白 (Norman Chao-pe Jen) ——他的话语与精神激励作用远远不止于这些讲座。能在父亲面前进行演讲是一件极其特殊的幸事。此外, 我也向我的丈夫大卫·奥康纳 (David O'Connor) 和我的孩子卢克 (Luke)、帕洛玛 (Paloma) 致以爱的敬意, 感谢他们纾难解困的幽默、耐心和支持。至于那些从四面八方前来参加讲座的诸多同事、朋友、邻居、学生和陌生人, 我也将铭记一辈子。

那么, 现在就把这些文字“打发”了吧——发送! 愿它们能够有些道理, 发挥点儿好作用。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2012年10月14日

目录



绪言	1
----	---

第一讲 我父亲写他的故事	11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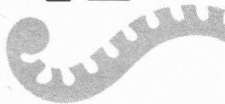
第二讲 艺术、文化与自我	55
--------------	----

第三讲 这一切带来了什么	105
--------------	-----

所引作品	173
------	-----

译者简介	187
------	-----

绪言



几年前，我参加过一个关于东西方文学的会议。会议期间，一位年轻的中国大陆作家被问及她为什么写作。^①对此，她回答说，她之所以写作，不是为了讲故事，或做见证，或与简·奥斯汀（Jane Austen）神交，而是因为她不喜欢出门，于是就想到通过写小说，既能赚钱又可以待在家里。对此，我全部能想到的就是 Oy（唷）！——这是意第绪语，只是用来表达我所猜想的许多西方听众的想法。

你们应该知道，自此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一点——关于为什么写作的问题。在西方世界中，人们想象中喜欢待在家里写作的作家很可能有埃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这一切似乎与艺术（Art）

① 2010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召开的“新世纪，新文学”会议。

有关，而中国人则很有可能会因此而联想起方便（Convenience）二字。例如，去年冬天，我遇见了一位为了将艺术作品送上太空而正在进行火箭试验的女士。她说，这是一项竞赛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让地球以外的世界接收到人造的完美作品”。这的确堪称一个惊人的项目——我想你们是不会有异议的。对于这个项目我的第一反应是：火箭！多好玩儿！但是我的第二反应则是，这是只有美国人才会做的事情——对于事物的价值和人类表达的目的，这位女士的态度迥异于中国作家的态度。在我看来，二者之间的区别代表了一个非常大的冰山的一角。

在邀请我做这些讲座时，约翰·斯托弗就建议我撰写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自传——他用了一种礼貌的方式告诉我，这也许是我能够处理的唯一一种能称得上是全球专家的主题了。毫无疑问，这一主题就是我自己。即便如此，这仍然意味着许多东西。因此，我选择用自己的事例，作为谈论上面提到的巨大冰山的一种方式。在短时间内，我也许无法将它明确地描绘出来。不过，通过我自己的故事，我将涉及“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并且尤

其关注自我的不同结构。我这样讲，意思是指我所论述的内容包括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的自我，以及在东方包括中国（20 世纪 40 年代我的父母从那里移居海外）在内的占主导地位的相互依存的、集体主义的自我。

我对这一差异感兴趣已有一段时间了。几周前，在与我过去的老师、来自爱荷华作家工作室的詹姆斯·艾伦·麦克弗森（James Alan McPherson）谈话时，他提醒我，这一差异在我 1983 年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就曾经探讨过。如果回顾一下随后我的那些长篇小说，其实可以从中看到一种辩证，一如一些作家所做的那样——如沃纳·索洛斯（Werner Sollors）简洁有力地表达过的、如同在认同和血统之间的那份紧张感。就我而言，这便是爱默生（Emerson）与孔子之间的抗争。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会在独立自主的自我和相互依存的自我之间感觉到这种紧张感：前者在真理内部发现意义，权利和自我表达对其至关重要；后者在从属关系、责任和自我奉献中发现意义。也就是说，当我们想起哈姆雷特（Hamlet）的断言“存在于我内心

中的（悲伤）超过了其外在”（I have that within me that passes show / I have that within which passeth show），我们便会产生共鸣，感觉到自己也有一些别人看不到的内在的东西。因此，这必须“首先是真实的”。^① 诚然，如果我们想起《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 1942）的结局，当汉弗莱·鲍加（Humphrey Bogart）说“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三个小人物的问题并非毫无价值”时，我们也会发现自己产生了共鸣。

存在于我作品中的紧张感仅仅是一个极端化的例子。全球化及其严重性总是被更多人所共享，正如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所指出的那样，东西方之间的自我差异实际上是“西方（指欧洲和北美）和其他各方（指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之间的差异。毫无疑问，正在加速发展的现代化给“其他各方”的个人主义带来了名副其实的流行。也许我应该承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把跨文化研究带进了这些讲座之中。就像我将在第

① 引用老饶舌者波洛涅斯（Polonius）的话。

二讲的前半部分所特意强调的那样，我将不会偏离各种各样的东西方研究成果——我认为自己的关注足够广泛，你们也会同意这种做法的。尽管如此，由于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许多文化（更不用说欧美的大量亚文化）存在着传统意义上相互依存而今却又波动不已的取向，但是有越来越多像我一样普通而又“低能”的人，当情况被允许时，往往能够很实用地开掘我们相互依存的或独立自主的自我，就连那些对此看法不一致的行家也是如此。至于我们这些“低能”的大人将会养育出什么样的孩子，谁会知道呢？我们无法判断以及明确地说出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子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无论如何，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通过描述一些源于我自身的经验，以及一些具有讽刺意味和轻而易举的事情，我希望不仅能为小说创作者，也为与文学并无特别关联的许多人提供启发和视角。

在我开始之前，我想说的是，在涉及文化差异的所有讨论中，我意识到了模式化的危害。一如社会学家马丁·M. 马格尔（Martin M. Marger）所说的那样，“一个群体单纯化的且过分夸大的信



仰，通常是间接获得的且抗拒改变的”，这显然应该被严厉地谴责并绝对避免。尽管我也意识到，对模式化的恐惧有时也许会引发对文化差异断言的不适，无论那些断言是被心理学家多么彻底地接受或者有着怎样坚实的研究基础。不幸的是，这种担心是完全合理的。在 1932 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记忆》（*Remembering*）中，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C. 巴特利特（Frederic C. Bartlett）描述了这样一个实验：英国的测试对象被要求在从只有几分钟到几个月之久的间隔里，反复复述一个有关印第安人的鬼故事。其结果发人深省：每到新的一轮，受试者都会记错更多的故事情节，他们会不自觉地编辑和重塑故事——例如，把捕猎海豹变换为“钓鱼”。对于他们而言，去除和改变似乎是怪异的故事元素，直到故事最终演变成完全与印第安人无关——事实上，直到故事最终变得已经完全被英国化了。

现有的模式是强大的。进行预判远比意想不到的完全听取要好，我们会根据自己已有的想法回忆事情。如果连怀疑也能以非理性的方式捍卫我们自身的模式的话，正如小说家阿兰·莱特曼（Alan